

看展去



毛利展品



南极展品



英国定居者展品



↑ ↓ 英国定居者展品



◀ (上接7版)

息、思想网络方面来获得他们的权威和凝聚力。因此,博物馆一直试图寻找与欧洲博物馆类似的收藏,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文化材料——馆内主要展示坎特伯雷地区的历史和欧亚地区的珍贵文物,此外,通过这种文化过滤效果,将帝国精英的品味施于博物馆参与者和公众。可以说,该博物馆是一个基于欧洲愿景、为当地白人的全球记忆提供途径的文化空间。

然而新西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又使得博物馆在之后的演进过程中不可能避免地发生了文化上的再造,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出与策展人、收藏家、受托人和观众最初未能意识的改变,与那些日益走向大众化和强调教育功能的欧洲博物馆逐渐产生明显的差异。

新西兰与母国最大的不同

必然是特有的自然环境和土著居民,最初两者均被视为周围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博物馆也展示这一地区的毛利人(Maori)生活、南极大陆探险,以及新西兰的鸟类、哺乳动物、昆虫、岩石、矿产和化石等。不难看出,坎特伯雷博物馆地理和民族的特性复杂而多元,而这成为激发国家地理认同的最早手段。赫斯特的继任赫顿于1895年出版了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该系列指南,1900年和1906年又出版更多版本,更多地博物馆定位为自然探索。1901年,赫顿陪同总督乘坐政府轮船在南部岛屿周围航行,收集了大量有关自然环境的资料。他的继任者埃德加·韦特于1907年在类似的航行中拉上了州长普兰特勋爵,然后从斯图尔特岛到奥克兰东部海岸旅行,进行收集、探险工作。新西兰的南岛是离南极洲最近的

一块大陆,因此这里常常作为探险家探索南极的基地,坎特伯雷博物馆也必然与南极探险和研究密切相关,比如参与了1929年至1931年的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极研究探险。这里展示着探险家们所使用的探险车和工具,再现了他们在南极的生活场景。此外还有栩栩如生的帝企鹅雕塑,以及1907年在失望岛遭遇海难的人们的救命船科拉克尔小艇(Coracle),同时也展示着很多南太平洋的鸟类标本。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后期的新西兰人对不同于母国的动植物的猎奇心理产生了反感情绪,呼吁构建动物和植物本土主义,而博物馆的实践在此之前就已发生转向,强调地方和国家(包括波利尼西亚)的本土特性。早在二十世纪之交,新西兰精英便通过结合毛利人的传统和从各方面保护毛利人的文物和建筑,

来寻求独立的民族认同,为新西兰和毛利(Aotearoa)、白人(pakeha)和土著之间建立独特合作关系的宣传奠定了基础。博物馆将毛利收藏品放在显而易见的参观中心,早已不是初期的新奇视角,这背后透射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间的新西兰突飞猛进。1907年新西兰成为英国海外自治领,具备了不完全国家地位,自身民族认同获得长足成长,从照搬欧洲文化到走向本土化。

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发展成为一个英国定居者记忆的地方——这本身就是1870年成立博物馆的目标之一。收集殖民时期的文物始于1898年奥塔哥早期定居者协会,并在1908年左右达到高潮,1916年在博物馆内建立了一个早期的定居者展览部分。博物馆的展品用主题展室的方式,诸如毛利文化、南极风光、运输、地质、

服装、家具等。西方藏品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为主,也有亚洲展室包括中国的藏品。进入博物馆,第一部分展区展示了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征服这片土地时的情形。独木舟已经成为毛利人勇敢、顽强的精神化身。第二部分展区则展示了当年英国定居者带来的家具、服装和日常用品,生动勾勒出当时定居者在新西兰的生活场景。坎特伯雷博物馆的布展,体现了两个世纪以来新西兰深刻的社会变化:英国人定居过程是一个欧洲文化逐步在地化的过程。

欧洲的博物馆,更多以大英博物馆为典范,致力于成为全民教育的文化空间,正如1753年的议会法案指出,“让所有好学而充满好奇心的人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态度,在某个规章制度下自由参观和查阅上述收藏。”同时为了追溯文化的源头,它们更多地关注古典文明藏品。在南半球植入博物馆概念的赫斯特等人的最初想法也同样如此,1895年出版的该博物馆指南中就引用了约翰·罗斯金的话:“博物馆的第一个功能是为无序的、粗鲁的民众提供完美秩序和完美优雅的典范。”然而南半球殖民地博物馆的特点,恰恰是由英国人对该地区的突然闯入而产生的,鲜有古典文明藏品,当地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形态、动植物群却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新西兰逐渐向独立国家迈进,展现这种独特性也逐渐成为精英们创建新西兰社会的使命之一。正如英国学者伊丽莎白·爱德华兹指出,博物馆的动态是模糊不清的。它们包含了表面和深度——在明显的展示和它所代表的更深层背景之间不可避免的对话,是一个不断在更新和重新解释过程中推进的叙述事件。

19世纪中期,博物馆概念之进入殖民地几乎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文化趋势,它本身就是当地中产阶级认同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进入却最终产生了再造,从而使博物馆这个欧洲的文化空间形式变形为殖民地的民族认同空间。坎特伯雷博物馆折射了19世纪以来宗主国和殖民地、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向后看,显示出当地人在前民族国家时代对于博物馆建设的构想往往由母国博物馆模式所界定,并发生变形;向前看,则会发现这些母国加以定义的文化空间,通常在本土化的过程中被当地人宣称为他们最早的民族资源。可以说,置身于坎特伯雷博物馆,领悟到的是一部全球史。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